

## 敬虔的忧愁 (小说节选)

文 李然

有些事，我没有和李远说过。我们大学毕业后，李远出版过几本诗集，我曾不客气的评论说，这些诗写的太紧张了。可能是我对长诗的欣赏一直带有偏见——不现代！缺乏灵动的乐感，过多的前后对仗，让我感觉似乎丢掉了诗歌本质。其实早前李远就因为这事和我争论过，我不爱与他争吵，一般到最后我就点点头，因为我清楚自己的偏见，直到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去了汉口的教堂，国家系统的三自教会，我们的友谊重新建立了另一层联系，语言的迷信在神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看上去像被破除了，似乎一场破坏圣象的运动重新将我们勾连，可是他的诗，在那个时候，又充斥着许多圣经文本的符号，例如“红海、约旦河、帷幔、磐石、异象……”，这确实也不是我欣赏的诗性神学，文本符号太明显了总会阻断诗歌的异象，但这个是我没和他说过的，实际上，这也是我在处理诗歌文段时，常遇到的问题，不过，这真的那么重要么？

2010年我们在广州又见面了，那可能是我们最近的一次见面。关于教会的事，我没有和李远多谈，因为我怕他误解我对圣灵的神学立场，在那个处处提防灵恩运动的时期，我不想给他带来这个层面上的困扰，虽然我根本不是灵恩派的信徒。那次见面在他简陋的出租屋里，我们聊了诸多关于诗歌与神学之间的历史文脉，我没法记起更具体的谈话内容，只记得广州梅雨季节的潮湿和闷热，满屋子烟味散都散不掉。他的房间里堆满肥皂剧的脚本，一集2000块的报酬，如果能写个几十集，也是笔不小的收入。我不认为他能轻松的做个剧本枪手，我几乎没看过他写的小说或散文。李远当时还在一个杂志社工作，但传统纸媒的衰落大概也是那时候开始的。和他长聊那一整夜，怎么熬到了天亮的，以我的经验，凡是聊的太久，往往记不住聊天的内容，到底聊了什么？以我们十几年前对文学事业的天真想象，估计也聊不出什么，话题最后都会滑向生计的问题，恋爱的问题，以及诸多抱怨形成的无聊批评，这算另一种娱乐调剂吧，自始至终严肃不起来。但有些人是这样的，在一个小圈子里呆久了，总怕脏了自己的天使心，一边谩骂着行业里的江湖权利，一边又只能站在一个脆弱朦胧的小世界里抱团取暖，不过，能取暖是好事，这十几年不就这么熬过来的么。

可这几年，日子也没那么好熬了，所有的困难都积攒在这些青春不在的人身上。来上海以后，我常和老高、徐旻、大垒他们在一块儿，老高也写诗，但这事光靠努力是不行的，我曾给老高看过李远的一些旧诗，被他批的一塌糊涂，我觉得老高时常说的有点过分，甚至毫无道理。年龄上他是比我大几岁的，早早就离开了学校，跟着一帮江湖人士混过几年，他喜欢聊十几年前那些小权利构成的圈子文化，谁是大哥，谁做跟班，谁调戏了谁，谁酒后说了什么，谁和谁之间解不开的权利矛盾，以及圈中各类八卦，来龙去脉好像他比谁都清楚，当他讲起十几年前，上海这个野生的文艺环境里，不论大小事都被他塑造成“阿拉就是亲历者”。记得我是在南京认识他的，那时的他就喜欢带个鸭舌帽，看着斯文但不惧社交。

我虽然对李远的旧诗有些想法，但不同意像老高那样粗暴的批评，可老高就是这样的人，是个凭情绪说话的人。2010年前后，老高自费出过一本诗集，给同行好友们挨个送上，那时候上海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老高，老高也被捧得老高，我也是那时候在一个bbs论坛里看到有人发过几首，轻巧灵动，有股子聪明劲儿，但我知道这种小短诗是容易写好的，反而李远那样乌央乌央几十行的诗是不好写的，至少不是我擅长的。但说回来，没谁会像老高这样，这么多年一直停留在短促的语调念念自语，这种表达口气到今天总是显得有点反智，我曾暗示过老高，关于搞创作到我们这个阶段，重要的是深入，而不是浅出，不然总停留在那么点小聪明里。我总觉得老高应该是可以听出来我在说什么，但我有次谈到文艺批评的视野时，老高不知怎么的，突然有点激动，打断我说，“不是的，无论是对周遭的现场批评，还是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的批评，这二者应该是平等的！并不是谁比谁更高级，相反，我觉得针对我们自身周遭的批评反而能更好的体现平等和在场……。”嗨！这话说的，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。我当然知道创作者是脆弱的，极度敏感的，小小的一次言语议论就可能让对方半年缓不过来，什么话都要藏着说，拐好几个弯儿说，甚至用一种极度细微的表情来说，潘小姐就是我身边极其善用表情来“批评”的人，她和最近女性主义者不太一样，潘小姐更像80年代那波早早经历过女性主义意识的人，混到今天，聊平权多过于将女性主义标签化，这样的人话不会少，但她极会把握分寸。

我欣赏这样的人，但也怕正眼看她描述问题时的表情。她是个善于拆解问题的人，这种能力在同行中是少有的，可老高压根儿不敢正眼看人家，虽说潘小姐其实不太在意老高如今的中年油腻，但也完全不给他们留任何使用爹味儿口吻的空间，再加上潘小姐是不太写诗的。我最早知道她，是在一个网络的文学论坛，估计2006年或者是2007年，她有几篇小说被转载在“小说版”那一栏，小说的名字叫《降卑为世界的模样》，题目其实和基督教没有半点关系，不过故事是有一些奇幻色彩的，她那时候受菲利普·图森、罗伯特·格里耶的影响，挺明显的，午夜文丛那套的书，当时也算是小众流行书了，但我觉得在国内，这也就是一种旧式的科幻文艺情调，主人翁总是分身在不同场景里，却始终被无形的命运女神控制，于是他回忆起了童年和母亲在一起有点扭曲爱恋关系，以及父亲永远是那个缺席的人，于是他就不停的自我分裂，从广场到小巷，从深圳的城农村到上海的外滩边，东北无尽的白雪皑皑或者云南种植咖啡的试验田，除了主人翁的分身术，更多的是无序的场景切换……；当然，我不能这么简化的描述这样的小说，因为我很难还原她在写作上的语言技巧，生动的编排和细致入微的精彩刻画。例如，她描述光和影的晨曦时，用了非常弥漫式的写作口吻，当描写那位雕塑家痛苦依偎在自己雕凿的女性半身像前时，没有多余苦闷之词就营造这一段落中异常凝固的清晨时光。我想这是简单而朴素的低语，我曾告诉潘小姐，这个段落让我想起威廉·布莱克的诗，但潘小姐却不以为然，也许她是以为我在调侃她的文艺倾向。总的来说，她是讨厌诗人这个小圈子的，权利固化，固步自封的整天抱怨中国诗歌的边缘化问题。的确，就像李远也说过，“诗在哪国不边缘？”。

我试图和潘小姐谈论威廉·布莱克，实际上也算一种别有用心，虽然我也不期待她能识破我的用意。从小说题目上说，潘小姐也许并不知道“降卑”这一词的神学含义，而整个小说弥漫的是“分裂”而不是“降卑”。徐旻曾经试图分析潘小姐写作上关于处理现实事件的问题。

题，可说到最后徐旻总是偏向于说“人”，可能那时候，在他眼里的潘小姐总有一层大小姐的面纱，他曾经和我说，“像潘小姐这样的海归作者已经非常有自觉了，你认为其他那几个人真的有那么左么，那你见过有左派穿巴黎世家么？一个墨镜顶我半个月工资了。”

除了老高和潘小姐之外，徐旻是我聊的最多的人了，自从离开了北京，我们见面的确实少了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在线上时不时的互动，徐旻比我小五六岁，入行晚一点，拥有独立批评视角的同时，他的内心也不断运行着某种古典主义人文精神？其实我也说上来，但我想徐旻是不能接受“分裂”的，但就像他说的：“怎么能不谈主体性！就该谈主体性，这是现在谈创作的时候最缺的，老在哪聊素材，但聊了那么多，你在哪？要么就在那儿说自己在田野调研，深入现实语境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类学家了，组队三五天的旅行团就田野调查了……”。但徐旻是能藏住情绪的人，只是碰见潘小姐，他常常不知所措。我总在想，徐旻真的能和潘小姐深入性的交流么？估计也看不清潘小姐在关键时刻露出的细微神情，那种半搭着眼皮的怜悯，却又被社会政治议题包装的天衣无缝。我想，在很多人眼里，她不过就是遇到了好的时机，活在了一个急需在文学上能够有广阔的现实主义情景的时代，又或一个女性做什么都正确的时代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像老高那种偏见，显得有点蛮横了，或者说嫉妒？

最近这几年，徐旻也是有情绪的。早前我就和他说过，这个圈子是没什么意思的，实践的现场都在自己那儿。也许我是相对闭塞的，但老高更是如此，把喜欢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，基本也不出来见人，他可能就是总说的活在过去的人，除了偶尔给我们看看他新写的东西，然后相互取取暖，也并不关心文学圈的那些活动，但他好像是有那么几个当代艺术家朋友，我猜这可能也是老高绕道自救的办法，没事儿就给当代艺术展览写个胡编乱造的新闻稿或五百字的展评，毕竟那个圈子看上去更好糊弄。自媒体时代让很多消息更容易获得了，聊起大垒写的几篇诗评，老高居然是看过的，虽然不喜欢大垒，但他们一起混过剧组，一起赶过电视剧剧本，那是个辛苦活，一旦一起写的人多，钱其实也没多少。据老高交代，那是个凶杀情爱惊悚动作悬疑剧，各类套路东拼西凑，但还得上下通顺，至少不能让演员自己演迷糊了，写两集拍一集，拍的时候连导演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，于是老高、大垒他们一帮人干脆住在剧组，刚写一段，马上就拍一段，最后影片投资方撤资了，这事儿才了了。我总觉得老高和大垒一起干过脏苦活儿，应该熟络，但从大垒的角度看，岂止是不喜欢老高，而是骨子里的鄙视，他觉得老高不学无术，混子心态。而老高不喜欢大垒，估计是看不上这种说话酸腐的倔老头，以我对老高的了解，他根本不会去分析大垒的创作，更不会主动去看，他能偷摸看看大垒那几篇诗歌评析，有点儿意外。

2017年的最后一天，我从北京搬到了上海，大垒以前也是从北京搬到上海的，但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和他除了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见过，说过几句话，也没怎么交流过。我不太喜欢主动和长辈搭话，但主要是无法面对他们那张写满爹味的脸，头一次见大垒，我还在上学，那时候他已经是圈里有些名气的作家，在大出版社里出过长篇小说、杂文选集，当然偶尔也写诗，也在一些文学论坛做过版主，喜欢自己蹿拢事儿，常自发组织公共性文学活动，搞搞作者研论会什么的，就像他自己说的，这叫“文学自治”。最近几年这档子事儿直接被疫情打了三寸，加上极端的文艺审查，渐渐也没了动静。来上海大概三个月后，突然看到他发了个

信息给我，说是得知我搬来上海，可以抽空一块聚聚。此后我们也时常聚聚，作为晚辈，我常常主动到离他家就近的咖啡馆，一坐一天的聊。除了徐旻，大垒几乎看不上我身边其他几个朋友，批评他们是感觉派诗人，大垒流露出来的那种“左”味也算是近些年少有的，在大垒眼里，系统里永远有敌人，这个敌人在他的脑海里非常具体，某个或某几个人，以至于每次和他聊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些福音派的牧师，非要逻辑化的辩论神学的基要。大垒是喜欢批判过多的文学象征这种描述手法的，像潘小姐那种小说，大垒是看不下去的，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没落的资产阶级情绪。实际上，大垒和我聊过不少周围作家和诗人同行，可惟独对我，他从不正面评论，有那么几次机会，我其实想听他说，但也怕听他说，估计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当面说，说过了难堪，说轻了也算在撒谎，何必呢……。

投机主义是大垒最喜欢用的批评词汇，这让大垒这样的左派，也逐渐从社会政治批判的前线，撤离到了大后方。他始终认为，那些跟随事件的临时反应，是一种投机主义，更是一种极端简单化的书写。大垒这几年的写的小说越来越像一种久违的报告文学，我个人认同他说的“简单化”是问题，但仅仅用投机主义来评价，其实也是一种简单化。很多事情上，大垒其实掩盖不住自己的个人情绪，这让我想到另一个北京的朋友——江陆，他和大垒总是散发一种相似的奋进情绪，所以，我在总和大垒说，你应该认识一下江陆。他们不是完全不认识对方，只是江陆总说“讨厌上海这帮人”，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，同样他也总会问我“你什么时候搬回北京？”，错愕的提问是江陆的日常，我已经习惯。离开北京前，我们在江陆、潘晓，潘晓就是潘小姐，因为本名潘晓，也就顺口叫成了潘小姐，那晚我们聚在她家里通宵喝酒聊天，聊到凌晨四点，潘晓的丈夫估计内心不爽我们的聊天内容，早早就回卧室躺下了，我现在还记得潘晓的踌躇，“为什么你们都要离开北京？”

江陆不以为然，我知道他心里总是有各种潜台词，即便在昏暗的光线里，也能看见他锋利的喉结和略显不按的口轮匝肌，像“没有永远的朋友”，他说过这话，“没有永远的敌人”，这话他也说过。在北京的时候，就总有他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循环播放，比如十几年前，我说我要做一个关于曼杰施坦姆的讲座，我粗略的介绍了一下我的观看角度，说到一半他就打断，“谈曼杰施坦姆没问题，很多人喜欢谈他，像你这么谈，有没有超越对曼杰施坦姆一般认识？”这种声音围绕我多年，也包括“还在搞形式语言那套？”，但话锋一转他又会建议你“该润色还是要润色一下”，一会儿说“创作里别带着情绪，情绪越多越低级”，一会儿又说“你们这帮成家生孩子的，小心步入中产”，聊到无语的时候也会耍耍横，说“基督教是反人类的，你别执迷不悟，一条道儿走到黑”，或者逼问“你什么时候从重新开始？”稍微冷静一下他又会沉思，“你能理解新的现实么？”

是的，他是那个常常逼着你碾碎修辞，重新确认立场、态度、知识分子视角以及新的现实问题的那个人，和大垒拥有共同的夙愿——击垮你们这些小资、西方白人谄媚者、投机主义的小知识分子、异域情调消费者的买办、系统的寄生虫、权利的依附者。而另一个声音同时又在回应他们，你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、粗俗无理的白直男、喜欢争权而非斗争、违背人性的布尔什维克们。

是的，这时候，我的脑海总会出现潘晓的那张故意没有化半点儿妆的脸，直视镜头，在采访中拒绝谈论那本被广泛赞誉的小说《降卑为世界的模样》，其实在那本小说之后，她也写过像《无情的满洲里》、《北海道的替身演员》等等这些偏向于纪实文学的小说，这在最近几年东北亚文学热的消费体系中，后面这几本并不太被关注。我曾经问过她，为什么不再像之前那样写作？她说，“作者不是为了杰作而工作，而为了生涯工作……”。我知道她和江陆某种程度的友谊，在疫情之后极速破裂，这似乎在我们中间早就能预知，因为那个友谊仅仅出现在前面那两种声音可以交织的时刻，我们满心以为这种交织时刻似乎恒久而长远，但如今却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矛盾才是持续更久的常态。“没有朋友”的江陆和愁绪满满的潘晓，他们起初是如何形成共情的？如何敞开心扉分享的？基于什么促成了这短暂的革命友谊？难道是在这个消费主义世界持守的批判精神么？魔鬼什么时候离间了我的朋友们？我为什么在他们矛盾的时刻处于缺席？如果是那个批判精神化身成迂回而行的恶灵，那么圣灵何时降临在他们中间？

### 《站在朦胧里》

在瘟疫的时代

有一把勺子 搅动，  
落在盐和胡椒的罐子里，  
星辰没有因此陨落，  
一个徒然的喷嚏。

好在，有 1984 年生产的螺丝刀，  
那是朋友的小拇指，  
沾了沾醋，写下了一行字，  
没头没尾。

（插图）

——是的，我还在写作！

李远之前给我的发的信息我一直存着，我们时常会转发给对方刚刚发表的诗，但是很少相互批评，我和李远确实很久没见了，很多话没那么容易说出口，即便我们共同拥有学生时代的些许回忆，但我愿意相信，我们共同拥有一定的自我批评能力，疏远一点也许是好的，某些旧日文青的病不会扩散在我们各自的生活中。我真的很想和李远谈谈耶稣信仰之类的话题，这是我们之前从没有过的话题，那些圣经性的辞藻隐隐约约闪烁在我们的写作里，其实我不知道大声说出来，算不算是一种愚蠢贫瘠的象征符号，或者只是担心被大垒、江陆认定为迎合殖民主义的主体，或者谈这事儿本身就会被嘲讽为去主体的玄学呢？

“诗歌本身的修辞结构是不能推敲的”，“队伍里的坏分子，只不过暂时可以联合。”，这是我最近接收到比较直接的评价，虽然短短几句话，我也大概能猜到这种调侃逻辑从何而

来，这话是徐旻转述给我的，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删减，但这是圈子里某位前辈诗人对我创作的论调，这个评价很戏谑又充满低廉的政治性，徐旻让我别太在意，其实我也没有在意，只是我总在想，他说的队伍在哪？什么时候写作者里出现了我不知道的共同体？小群体？在北京？在上海？在东北？还是简体中文写作圈？还是一群喜欢喝白酒的醉汉盟友？这本身就很荒诞，我问徐旻，是不是我脱节了，离诗歌这圈子太远了？徐旻再次强调，别他妈在意了，这本身就是他们那一代的视野局限，我们的语言环境本身就在不断更变，是他们远离了诗歌写作的本意，而不是你。徐旻真是取暖的好伙伴，老高听说这事之后，除了大笑，留下俩字儿——虚伪。我不爱说人虚伪，因为人类本身就有虚伪的那一面，分裂才是现代人的常态，而这种分裂，恰恰是我在李远、潘晓、江陆他们这些人身上看到的，老高不会承认自己的分裂，也许在创作形式上，他努力经营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外在风格特点，但是看看他的生活就知道了，这种东西哪里能这么容易遮盖呢。

徐旻是个好人，做好人不容易的，连他自己也形容自己是折中主义者，但我不会认为某种折中该被钉在耻辱柱上，况且徐旻的折中视角并不是一种油滑的中庸，也许他的周遭好友都在这几年流落在更加错愕激进的语境里，而这些周遭人所产生倒影总是缠绕着徐旻。我们要面对这种思想的错位，同时也需要警惕所谓的同步意志，这是我对徐旻说的话，我能感受到徐旻的孤独，这种孤独不是他身边的人带来的，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一个拥有凝视视角的人，怎么会和今天许多人为伴呢？而折中恰恰是徐旻选择的曲线救世，这么说他不一定认同，可是在层层社会政治现实的沮丧之下，踢一脚漂亮的弧线球，绕过制度高墙，又回到文学本身，也并不是那么不堪。

徐旻会让我想到常讯，他是我们教会里的中年牧师，在没有全职侍奉时，他也一直在写小说的，我们曾有过几次深入的交谈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在一篇散文中我曾描写过他，“他在梦中惊呼，闪电击中了他背后的圣灵，是的，该走了！钻进旷野吧，用白鸽幻化的金钥匙开启那个我们熟悉的世界……，1997年春，改革宗长老会把他委派到没有人愿意去宣教的巫术村……”据我所知，他一直在东北宣教，布道中他讲过许多他眼中的萨满，以及萨满在东北一代的历史，有历史学研究基础的他，显然是知道怎么用一种更平衡的方式，谈论神学和近代史。我很喜欢他对布道信息的多维释义，当许多三自教会跑来诋毁他的神学有异端思想时，他却并没有争辩过什么。我看过他写的名为《十封信》的布道稿子，要义清晰明确，但又超越智识层面的灵性阐释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常把他和徐旻联系在一起，徐旻虽然不排斥我讲论这部分信仰要素对我诗歌的影响，但每次提到这个部分，他都会友好略过，或者他会说，你有你的理解，但在我的理解上这是你创作的客体，而非主体。说真的，每次聊到这个部分我都不太确定他到底再说什么，但创作里总会有不可强求于理解的指向，所以，即便我和徐旻有着创作方面的深入交流，但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形成实践的共同体，这种东西在今天的写作环境里，怎么还会有人相信。当然，就像老高说的，“群体政治本来就是临时组织的，搞一搞就会散的，最后不都是自己搞自己的？”，一直以来“反而求诸己”总被诟病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倾向，不过像老高这样的人也凭着对现实的本能的嗅觉，做出了选择，像大垒那么左，不是也经常自己一个人憋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大垒是怎么生活的，这种把写作看的比命还重要的人，在疫情的时候，哪还有剧本枪手的活找他，但大垒或者江陆都是渴

望共同体的，只不过也就他们这样的人还在等待一个共同体，这种政治性永远别想从他们身上祛除，面对这种诉求，他们所期盼的未来，不过一种等待弥撒亚降临漫长过程，以至于我总会想，在这种翘首期盼中，谁更像那个意识形态上的资产阶级，这难道不是一种没落的布尔什维克贵族么，但我不能这么说，因为除了他们以外这个领域显得更加糟糕。

小小鼓吹就能拒绝沉浮？  
没落的幻想，  
走在闸北以北的拆迁队伍里，  
四处打探一场战争的最新战况。

街面只有东南角的电线杆，  
印满了一串串不在服务区的数字，  
从前的人索窝着脑袋，  
一边哼唱着闽南语的小调，  
一边唾弃着路过的商贩。

而他们是能说中文的，  
也没有口音的未来一代，  
不需要能指就剪裁修辞，  
换句话说，  
如何流浪就能如何流亡。

也许我们这边儿需要江陆，这样留着中分，面色枯黄，操着北京儿化音的人，但他不需要这一刻的我，一个只会搞资产阶级喃喃自语和寻求上帝呵护的旧人类。徐旻若知道我这么想，又会说我在发嗲，“人家并没有这么说啊”，徐旻也是能感受到心思拧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，他是能在各种聊天中把你从莫名其妙的纠结情绪里拉出来的人，所以我说，他更像个温存的传道士。但有些人是拉不出来的，说什么都不好使！对啊，要么不说，要么就说“挺好的”，我对老高总是说挺好的，但老高能闻出味儿，说明老高的本能身体经验还在线，——好好说！啥叫挺好的？老高这种调儿门，在上海男人里找不出第二个。挺好的，这个词既不是形容坏，也不是形容有多精彩，反正就是懒得说了，怎么说呢？如果真有一种所谓的创作共同体，那可能就是玻璃心共同体吧，把创作看的如此要命，能怎么强悍？徐旻曾说有一种共同体叫翻译共同体，就是一起接翻译的活儿，反正在中国，永远都需要翻译，即便你用人工智能先翻一遍，那不是还得再校对一下么，能节省了大把时间，但也无情的预告了各位精通外语的人士，这活儿以后真不好接了……

电影《十字街头》台词：

“小徐，不要悲伤，你不是还有翻译的事可做么？翻译也是工作啊！翻译怎么就不是工作。”

老高的英语极差，但人家还去南美和拉丁语诗人交流过，怎么交流的我真不知道，但估计交流的应该不是写作吧，老高这种幽默的人，应该是有他的办法的，只是如果潘晓也在场，他一定是坐在角落里那个假装沉默的人，是不是他也窥到了潘晓那种眼神？去年夏天我去的北京的时候，约潘晓在公园里散步，说是公园，其实是北京这几年新开发的沿河步道，这种沿河景观步道上海早些年也开始重新整治，我最早在北京就是住在新源里西，靠近亮马河这一带，那时候的河道还能闻到阵阵腐臭，特别是在一阵暴雨之后，腥腐的味道四处蔓延，到了夏天蚊虫比较多，我会带着花露水，站在一个破石墩子上，看着河对面的老头儿用力拍打着柳树。潘晓现在不会再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了，反倒是问有没有打算要离开这个国家，是啊，什么时候走？去哪？这已经不仅仅是潘晓会说出的话，但我总觉得谈论移民是迂腐的中产话题，难道五年前、十年前，我们没有预知今天的现实么？或者这种现实已经是一种全球处境吧，不，潘晓不这么认为，可是我们这样的中文写作，出去能干什么呢？这么多年我们努力的甩开肤浅的身份政治话题，立足中文脉络的历史语境来写作，钻到国外干什么呢？本就在边缘，何不更边缘一点？本就不堪，还能更好么？徐旻曾说过，他希望一个没有中心，也没有边缘的世界，他的杂文《共为星辰》曾给我很多启发，用一种开放的历史观来说明我们的历史处境，过去不再是线性序列，也不是多重线性的无序组合，而是一种现代性语境之外的平行时空，它不断召唤着我们与它形成新的同在关系，可江陆觉得徐旻的说法是一种隐性的历史虚无主义，而他始终奉行和坚守着重回现代性的坚定立场。

能走多远走多远，  
不要回头，  
因为星球的运行轨道朝着，  
母腹被撕开的口子，  
狂奔，也不曾回头，  
麦绥莱勒的城市里，  
住着 200 斤的布尔什维克，  
由于你的体重不达标，  
配不上月光来洗涤，  
晨絮划过的剪影。

只是，他们约定好了。  
能走多远走多远。

他和我是旧人类，  
喜欢多层罩染不重要的细节，  
没有谁来委任，衣食无忧的主体，  
因为被乌鸦窃取的客观世界，  
一阵骚动，  
掉进我们手伸不进的耗子洞，  
你窃喜，我们还有身体，



可怎么才能拥有 200 斤的苗条，  
以及尖锐刻薄的发际线，  
好在距离不算太遥远。

于是，他们听不见远方的旨意，  
却大声呼喊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

我绝对不会和老高聊什么移民这种话题的，对他来说，能靠着老房子的动迁费撑下去就不错了。老高总会陶醉的和我说起那仅有几次海外经历，除了去过南美，他还在立陶宛交往过一个装置女艺术家，在塞尔维亚时拜访过的前南斯拉夫左翼领袖，在胡志明市参与几个声音艺术家搞的前卫诗歌艺术节，老高眉飞色舞的讲述过去的同时，总会补充一句，那时候我还很瘦。这让我突然想起潘晓曾说过，中年男性的油腻是和体重成正比的。其实，我还是会劝老高适当运动一下，可老高甚至不会自己做饭，明明生计窘迫，每天还要靠点外卖度日，深怕做饭那两下子磨灭了他的整合世界的诗性。我当然知道老高过去怎么样，混迹千禧年时期的文学论坛，这帮人谁不都觉得自己风流倜傥、生机无限，简直自恋的不堪入目，看看那时候挂在他们的 QQ 空间和博客上骚照就知道，还有他们的那些 BBS 上的网名，什么口瓚、边陲、四十月、宽河、弱水……当然也有用真名的，那是更老的一帮人……大垒总会说，别他妈回忆，别老说十年前好，十年前真的好么？什么时候好过？因为大垒的看着比实际年龄老，加上我学生时代就耳闻过他的各类事迹，我就总以为他是经历过九十年代的作家，九十年代也不好！大垒叫我别幻想，这里就没好过！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垒总是形容自己是条野狗，但这么说的确让他和他的同代拉开了某种道德差距，他的同代都各自有各小权利圈，大垒不愿意搞这种话语权圈子，就像徐旻说的，大垒还是很知识分子的，上点年纪更显得可爱了。大垒当然是可爱的人，但真的别逼我一遍遍讨论他的报告文学，我知道徐旻是可以接受的，这就是徐旻的开放，虽然他也会觉得不能把自己活成大垒，但徐旻看问题比我全面，我没有细细看过大垒早年的创作，但细想过去，他的同代人那时候都在干什么？显然大垒的工作没有被同行好好正视，大垒嘴上说，我并不期待能有什么善意的评价，但这个情绪钻进在他今天的写作里，就不难发现字里行间都透露出，我就是和你们不一样，我就是不让你们看懂，我就是不让你们消费我。我以为江陆会欣赏这种倔强，但连江陆都说，他就不能好好润色一下么，非得这么干。是啊，我怎么忘了江陆是德语文学出身，钱都造在了那几个电子管音箱上了，我从没去过江陆家，只知道他喜欢听古典音乐。多点爱好是重要的，徐旻喜欢玩相机，潘晓喜欢五十年代爵士乐，老高则喜欢和当代艺术家玩儿，特别是搞声音实验的一帮人，天知道老高是不是接收到什么太空信号，喜欢在某一行诗句只放一个字，或者一个动词，有一次我看到他用了八个动词排列的八行诗句，想骂人的心都有了。

创作的时候不期待，其实是好事儿，但并不是什么都不期待，只是不期待周遭所回馈的声音罢了。李远曾说，“我的写作里没有别人”，他怎么这么早的就有这样的意识，那时候我们不过才刚毕业，并没有太多因生活窘迫，以及制度现实给我们的历练，难道仅仅是因为年轻么？这么说有点矫情，我见过几个更年轻的诗人，或是刚开始写小说的作者，疫情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很多都从国外回来，匆匆落脚，不知未来去留，虽看起来满是期待，却又不屑。我

不敢和他们说“不要期待”这样的话，不然总显得老气横秋，况且他们也不关心什么文学历史语境这种事……。我那天听到有人谈，“云游”这个词，这个词相当中性，并无褒贬，可能可以是逐渐替换掉，我习惯滥用的“流浪”这个词，这些未来的人，其实，也挺好的吧，只是我再没有那么想接着说下去的欲望了。

无论是旧人还是新人，  
在任何一条河流的沿岸，  
碎石和杂草保卫的昆虫世界，  
里面总有四万四千赫兹，  
介词、动词、形容词，  
和一些我们不曾听说过的名词，

谁做主语，谁变成宾语，  
一段由引号环绕的立体声音箱，  
虽说不是 5.1 声道，  
只要蓝牙连接，  
就总能听见，  
敬虔的忧愁。

你曾指认过  
那是不再图像中的行动，  
但降卑此地的肉身，  
却在河面上行走，  
我认得那倒影，  
它总像我指明，  
城头的望楼上记录着，  
二十四小时都应该闭上眼睛，  
不要吝啬颤抖的嘴唇。

这样就能分别，  
地上的忧愁和敬虔的忧愁。